

故人故事

# 这就是我的日记

## ——一个小学生的抗战日记

张林忠  
(空军退役军人)

“我们的祖国，在危乱之邦，盗匪那么猖獗，狼心狗肺的鬼子，贪心捣乱，得寸进尺，真是可恨极了。”这是一篇写于1939年12月22日星期五的日记开头部分内容。

今年夏天，在海门老街旧货市场，我发现了一本民国时期的小学生日记，当时就心头一颤。这本已经发黄的线装日记本，除了四角有点破损之外，基本完好。日记用毛笔书写，小楷娟秀稚趣可爱，端正工整，有些字颇有法度。

日记本共收入日记20篇，时间跨度从1939年12月22日到1941年3月8日。其中1939年有14篇，1940年5篇，而1941年只有1篇。

日记本虽薄，有些句子也不通顺，但从一个别样角度看到抗战期间的那段艰难的抗战岁月，同时是一名战时小学生的真切感受，字字句句叩击震撼今人之心。也让我们感受到一颗有着远大抱负、胸怀天下的年轻的心，看到了一双能发现美的眼睛，看到了一个积极向上、对未来充满无限向往和信心的中国少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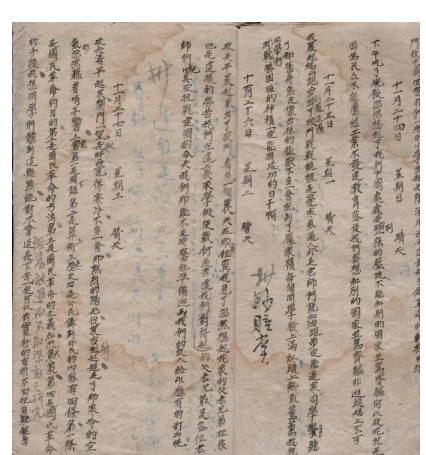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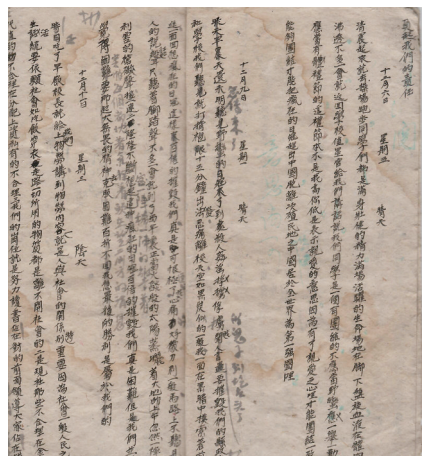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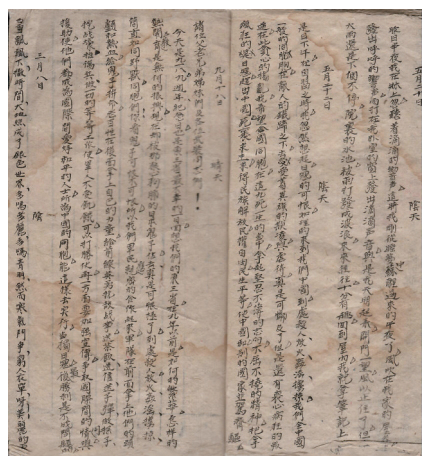
—

这名少年并没有署名，我们叫他“建国”吧。

1931年，日本关东军蓄意策划发动了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悍然侵占我国东三省，开始对中国东北实施殖民统治，中华大地山河破碎，生灵涂炭。“九一八”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，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。中华民族也开启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。

当时建国正在某所乡村小学就读，这里有山川、河流，有广阔的田野。关于学校的信息，日记中也没有，仅仅在日记出现了庞家庄和西平里两个地名。北方以“庄”命名的村子颇多，庞家庄显然是个村庄。这里所说的庞家庄，疑是山东莱莒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的第九年，即1939年，也就是“七七”事变的第三年，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。建国在1939年第一篇日记开头交代了时间、天气状况：“十二月二十二日（星期五）



晴。”可能“晴”字还不会写，错将“时”当“晴”字。

接着他写道：“同胞们，快从美梦中转醒醒来，一致对外。尤其是我们学生，是国家的主人翁，不要把光阴虚度过去。因为光阴是宝贵的，今天过去，明天不再复回。所以我们小学生要百倍地学习，培养将来抗战建国的人才。”日记中，有错别字修改的痕迹，大概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。

建国在这则日记最后写道：“这就是我的日记。”建国记的日记，大部分是之前的所见所想，所以当日的日记基本上以“昨天”“前天”开头。

幸运的是，这所偏僻的乡村小学，并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，使得学校的教学秩序正常进行，孩子得以能继续在教室里接受教育。在学校学习过程中，建国感受到了日本鬼子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沉痛苦难，他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。

“因为民众不能团结，工业不发达，教育落后。我们要和别的国家并驾齐驱，非迎头赶上不可。”（11月24日）这正是当时中国落后遭人欺负的最主要原因，所以在建国当时就读的学校里，有一位执事官，给学生讲话：“有了亲爱之心，才能团结一致，能够团结，才能把疯狂的日寇赶出中国，脱离殖民地之，中国居于全世界为第一强国哩。”（12月6日）

更为难得的是，这所乡村学校还坚持组织学生参加体育锻炼。建国在1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个同学脸上都满红，头上热气薰薰。我想，同学们有战胜困难的精神，一定能成功的日子啊！”少年强，则中国强，诚如中华民族有战胜困难的决心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。

在这20篇日记中，建国不止一次鼓励自己和同学们，要以主人翁的态度，顽强拼搏、努力学习，将来报效国家。他在1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当他（孙中山）弥留的时候，还发出微弱的呼声：‘为和平奋斗救中国！和平奋斗救中国！’回想我们一般的小学生，把光阴虚度过去。这怎对得起亲手创立的孙总理呢？”日记接着写道：“尤其在抗战建国的今天，我们哪能不及时奋勉，准备迎击我们的敌人、给以应有的打击呢？”

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十六天，即1925年2月24日，预立了三份遗嘱，这三份遗嘱是《家事遗嘱》《政治遗嘱》和《致苏联遗书》。在11月23日的日记中，建国继续写道：“特别重要，就是孙总理给我们的遗嘱建国方略、建国大纲、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救中国。”这和孙中山《遗嘱》内容相符：“现在革命尚未成功，凡我同志，务须依照余所著《建国方略》《建国大纲》《三民主义》及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》，继续努力，以求贯彻。”

在11月27日的日记最后，建国写道：“把日寇赶出鸭绿江边，不受列强的压迫，反对列强，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。”这短短的几个字，让我们似乎看到了他笃定的眼神和坚定的信念。这种信念来自前方的抗战战士，来自学校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。一个小学生，尚且对抗战的胜利充满足够的信心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而作为郁达夫这样的社会精英，却对当时的形势并不乐观，“对于最后胜利必属我的这句口号，是有七八分怀疑的。”直到去了徐州、到武汉看了布防后，郁达夫这才完全有了百分之百的必胜信念。

日记中，出现了一位姓黄的老师，对学生谆谆教导：“给我讲读书的技术，和读书的益处，说‘语’云：学问之道，如穷如尽。早考夕究，口诵心维，发奋忘食，日求月进，无体息肩之期。”国难当头，建国从小就立下了伟大的志向，“令我辈青年，岂敢怠惰，苟安畏劳……将来学业广博，为家良子，为国栋梁。”

在每篇日记中，黄老师都有修改，甚至有批语。比如在11月26日的日记批语中，老师不仅表扬建国“造句通顺，立意甚美”，还鼓励他树立信心：“努力吧，前途是光明的！”正是在老师们的鼓励和正确引导下，建国在日记中，时时在牵挂国家命运、前线战士的安危、家乡父老的辛苦。他不止一次写道，如果不好好学习、虚度光阴，“这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父老兄弟，及各位老师呢”。

由于资料缺乏，我们无法知道这位黄老师以及这位小学生后来的命运，但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，中国抗日之艰难，前方战事之复杂，百姓之穷苦。这种



制图 金子芋

担惊受怕的日子也无时无刻不缠绕在幼小孩子的身上，如影随形。11月29日那天晚上，建国做了个噩梦，“觉得好像是日本鬼子，一阵厉害的枪炮声、杀喊声，冲到校门来，挥着刺刀，叫我们立刻离校。”但战争越来越远，就在12月9日这一天，“天还未明，忽传来了到处杀人、奸淫、俘虏的鬼子，要摧毁我们的政权和学校，我们就打背包，限十五分钟出发，忍痛离校……”师生疾走到了一个叫“西平里”的地方，又忽然传来“一阵厉害的枪炮声，接二连三隆隆不断，密一阵稀一阵地响着”，但师生们听到后也不觉得害怕，“每个人都沉着气，探着头在望前方的消息”。

大概，对于这样的枪炮声，师生都习以为常了吧。郁达夫在写于1938年的文章《在警报声里》有类似的描写：“静候上五十分钟的时候，老百姓总不必等警报解除的钟声再响，就会从防空壕，疏散地走回来。被轰炸的次数愈多，逃飞机的家经验也愈足，习以为常，就觉得敌机的施虐也并不足怕。”

二

时间到了1940年，中国人民全面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，国际形势也发生深刻变化。德军打败了英法两国军队，希特勒以闪电战燃起的熊熊战火，迅速席卷半个欧洲。1940年9月，德、意、日正式结成了三国同盟，法西斯势力猖獗于世界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极为艰苦的时期。

1940年5月17日，我们的小建国一早就起来，到树林里游玩，享受着微风拂面，显得很高兴，看见“地上的花草丛生，长着参差不齐，现出亲绿可爱的颜色，上面顶着一颗一颗明珠似的露水，十分可爱”。此时此刻，他是快乐的，在他的周围，他目光所及，到处充满温暖和生命：阳光从东升起，莲花清脆清香，他由“花中的君子”莲花而联想到人类，并鞭策自己要“去战胜那恶劣的环境，改造社会”，唯有如此，“才不被莲花所笑”。

经过前天一一场大雨之后，5月22日，天气格外清爽，在下午上自习课时，建国又忽然想起日寇的可怕：“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，我们全中国的同胞，在敌人的铁蹄之下，去受着异族的欺凌与虐待，真是可怜极了”。

更使他感到更可恨的是“丧心病狂的叛逆”！小年纪，已是非明辨。小年纪，正气凛然。当时的抗战形势依然严峻，蒋介石在3、6月先后两次与日本展开正式谈判，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，并于3月拼凑成立了日本占领区内的统一的伪中央政府。

在幼小的建国心里，“把疯狂的日寇赶出中国，求得民族解放，民权自由，民生平等，使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并驾齐驱”一直是他最大的愿望，在多篇日记最后，都有“使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并驾齐驱”的愿望——可以告慰先人的是，如今的中国日益富强昌盛，他的愿望被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。

当时，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，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，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。1940年，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重大发展的一年。

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，日军仅在华北地区使用兵力在50万人以上，

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“扫荡”就有109次。9月19日这一天日记，堪称一篇演讲稿。我们看到建国站在人群前面，振臂疾呼，不妨将这天的日记摘录如下：

诸位父老兄弟姊妹们及各位武装同志们！

今天是“九一八”九周年纪念日，也是东三省最不幸的一日。回想我们的东三省，在九年以前，是如何的繁华，怎样的热闹，教育是如何的振兴。现在却被那狼心狗肺的日本鬼子占去，真是可恨极了，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，简直如同野兽。

同胞们！你看鬼子可恨不可恨？所以我们军民应紧密合作起来。军队在前面拿上他们的头颅和热血，给鬼子拼命。老百姓在后面拿起自己的力量……使鬼子不受饥饿，可以打胜仗；再一方面，要加强宣传，争取国际间的同情与援助，使他们都成为国际间爱好和平的人士，中国的同胞能有这样去实行，当独日寇最后胜利，是不成问题的。

自“七七”事变卢沟桥日军打响侵略中国的第一枪后，数十年的宿怨，四万万中华儿女的积愤，一夜爆发，并立即演变成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之悲歌。

5月1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：“我希望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，都拿起十二分的精神，百折不回的志愿，一定可以把疯狂的日寇，赶出中国……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！”

正因为建国对抗战未来的信心，在他眼里，即便炮火连天的艰难岁月里，也有美的发现：“雨打在我卧室的窗上，发出‘滴滴’声音……院里的水池，被雨打成波浪，来来往往，十分有趣。回到屋内，我就拿笔记上。”“见枣树长着青翠的绿叶，一颗一颗的明珠似的，水点挂满叶上，真是美丽。”5月15日和20日的两篇日记中，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天真、对大自然充满好奇、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纯真孩子的形象。

但建国也许不清楚的是，1939年冬至1940年春，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，以重兵向陕甘宁边区、晋东南和冀南的抗日根据地等发动了武装进攻。而日本全面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、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，给抗战增加了更大的困难，国民党内一些人更加动摇，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。

1940年8月至翌年1月，为遏制投降和妥协暗流，打破日本侵略者的“囚笼政策”，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主动战，即“百团大战”。

到12月初，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，毙伤日、伪军2.5万余人，俘日军281人、伪军1.8万余人。“九一八”不抵抗之耻辱，经此一战而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。

回顾百年历史，我们已有镜鉴：教育盛，虽战乱纷争，仍人才辈出、民力丰沛、国体向上。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下，坚持了八年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，创造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成就，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。而更多像建国就读的乡村学校，为中华民族文明保留了火种，让中国有了希望。

今天，借这本泛黄的《小学生的抗战日记》短记述，略加以述说，以志日本军国主义之惨无人道，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。历史不可忘记，我辈当自强！

阡陌岁月

# 一张旧船票

钱国丹  
(一级作家，有趣的老太太)

那张船票只有一指宽，且薄若蝉翼，票面印的是温州——北白象，票价2角5分，外加保险费1分。而我的家却在北白象的下一埠——柳市，票价是3角，外加保险费1分。

那时候我在温州读书，来来往往都坐这趟客轮。那些船票，我用过就扔掉了，唯有这张温州——北白象的船票，我把它夹在一本古诗集里，一夹数十年。

这段水路也就三四十公里吧，路况却非常复杂。瓯江的风浪有时挺大，为了少些颠簸，那对姐妹轮总是拴在一起，并头前进。但我还是免不了晕船。瓯江轮到达瓯江码头后，乘客们就奔船上岸，疾跑五六百米——晚了就抢不到位置了——冲向等在河内的一条小火轮。对于挑着行李、扛着麻袋或拖儿带女的乘客来说，赶这段路就是搏斗。

我们管瓯江轮叫“江轮”，管内河轮叫“河轮”。河轮小多了，一个机动的船头，挂了一串拖船，模样颇像火车头和后面一节车厢。

那一次放假，我从温州回家。开船的时间是下午1点，我来到安澜亭码头，已经是正午12点了。

码头小吃店正热闹着，飘散出的香味很折磨人。我的胃肠在不安分地动荡。我没吃中饭，连早饭都没吃，因为我的口袋里只剩下4毛5分钱了。如果买了到柳市的3毛1分的船票，能让我支配的就只有1毛4分钱。

面店的牌子上写着：肉片每碗1角5分。看着那两片薄薄亮亮的肥肉，我馋涎欲滴。我已经半年不知肉味了，这诱惑难以抗拒。可是我如果买了肉片面，买船票就差了1分钱。

我面临着艰难的选择。我绞尽脑汁，想弄到1分钱。口袋已翻过一百遍了，显然没有躲藏的一分硬币。码头上有人伸着脏兮兮的手讨要零钱，但我一个十六岁的女生，打死也不能干这等事啊。我想，也许会遇着熟人，可以借1分钱，但举目四望，却满是陌生的面孔。最后，我在那1分保险费上打起主意。我想，轮船公司完全是多此一举，保什么险？饥饿困顿的生命有那么重要吗？

我来到售票口，递上3角钱，说，买一张到柳市的船票，不要保险。小窗里传出一声吼：神经病！要不要保险是由你说的吗？出了人命谁负责？

我叹了口气。心想别人都这么珍惜我的生命，我就没法子自暴自弃了。

我徘徊在安澜亭码头，望着滔滔江水，双眼发涩。离开船只有半个小时了，肚子的抗议越来越厉害了。我什么都不顾了，买了碗肉片面，狼吞虎咽下去。再买温州到柳市的船票不够了，我就买了张到北白象的。我想，剩下的那段路，我可以步行，甚至跑步。我的腿长着呢。

那天的轮船是逆行行舟，走得极慢。胃里装了两片肥肉，我觉得浑身是劲。我把那张票放进贴身的口袋里。在单调的马达隆隆声中，我渐渐迷糊了过去。

我被船舱里的骚动惊醒了，一位70多岁的老头在呼天抢地：我的米啊，我的米啊！原来这老头从温州的亲戚家借到30斤米，他刚打了个盹，那袋米失踪了。

人都在船上，米自然不会飞到天上去。轮船管理人员一遍一遍地查问。可事情就这么蹊跷，没人发现偷米贼。粮食倒是翻出了几袋，可都说得出来处，且也没有哪一袋刚好30斤的。

老头子绝望了，他以年龄不相称的敏捷，冲出船舱，纵身跳进滔滔江水里去了。在一片呼救声中，水手们有拿撑篙的，有抛救生圈的，可风高浪急，投水者在漩涡里转了一个圈，就不见了。

轮船麻木地前进，人们却在议论纷纷。有人说，这贼伤天害理啊，要了一条人命！也有人说，贼虽然可恶，但也是救自己一家的性命。还有人说，保险费这一回可派上用场了。

从温州到瓯头，江轮足足驶了两个半小时。然后我背起行囊，一路疾跑到了内河埠头。

河轮开了，我把目光投向窗外。破败的村庄，了无生机的田野，都向后退去退去。小火轮喘息着，一站一站地停靠着，到达北白象埠时，已经夜幕四合了。

从北白象到我还有十三四里路。我打听好了，抄小路要近四分之一。我顺着人家指引的方向迈开了大步。周遭宁静，连个灯光都没有。那时没有电灯，连油也是凭票供应的，没有要紧的事，谁也舍不得熬夜。

小北风嗖嗖地吹，四下里连个人影都不见。因为有两片肥肉打底，我并不觉得冷，脚步也非常利索。冬天的田野空空荡荡的，为了早点到家，我连田陌都不走，只从农田里横穿斜插。走着走着，忽觉哪里不对劲了，猛一抬头，差点撞上两个黑黝黝的坟墩，两具白皮棺材让我头皮发麻。我扭头就跑，有个东西箭一样从我脚下窜过，我紧张得气都喘不匀了，等我闻到黄鼠狼特殊的臭味，已经冷汗淋漓了。接下来的路，我跑得马不停蹄，挎包拍打着我的脸，好像给我鼓劲。我那时候的心脏真是坚强啊，无论我怎样使用，总不会出现故障。远远地，我望到我们村子模糊的轮廓了，才长长地松了口气。

那一趟回家，成了我永久的记忆。上世纪末，我偶尔翻到了那张旧船票，感慨良多。当时正流行《涛声依旧》，那句“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”，让我有一种寻梦的冲动。我曾想赴温州重坐一回那班客轮，可被告知公路拉直了，大桥造好了，温州到柳市，只有20分钟的车程了。客轮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，寿终正寝了。

只有那张旧船票，还依旧没有在我那本古诗诗集里。